



# 清史译丛



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第一辑



# 清史译丛

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第一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译丛第一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300-05465-X / K · 263

I. 清...

II. 国...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清代

IV. 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629 号

## 清史译丛

### 第一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8 插页 1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9 000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序 言

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搞好清史编纂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既要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继承和弘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是完成新世纪我国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切实保证。

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列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融入世界。研究纂修清史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时，应高度重视清王朝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背景。纂修清史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如何认识和体现出“世界眼光”，即是重要的理论准备之一，为此，

我们需要加紧这方面的研究。

纂修清史，既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也是面向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在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数千年，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华文化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文化需要人来传承。今天我们纂修清史，正是在继承、发展和弘扬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继往开来、重铸辉煌的挑战。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华民族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部分。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纂修清史，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实，积极探寻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不仅能做到光大中华文化，而且能促进全球文明。

清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优秀的清史专著，应该出自中国历史学家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也不排斥了解和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及时地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加强海内外清史研究学者的交流。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决定编辑出版《清史译丛》。该译丛将视具体情况，通过“专题研究”、“论著及文献选译”、“学术综述”、“名家访谈”、“海外专稿”、“理论争鸣”、“论点摘编”、“新书书评”等栏目，及时地将海外清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来。《清史译丛》是广大清史研究者、爱好者共同的园地，让我们共同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她，使其在清史纂修工程中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1月



## 目 录

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专 栏

中西文化的抉择

——在“清史编纂暨编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戴 逸 / 1

### 专题研究

用世界眼光看清史

——兼谈中国文化于 17—18 世纪在法国的传播

耿 昇 / 7

## 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

——以历史学研究为主线的考察

朱政惠 / 21

## 麦迪森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评价及有关评论

叶 茂 / 42

## 国际互联网有关清史的英、俄文资源基本状况

分析及其他

王旭东 孙 洁 / 50

# 学术综述

## 1990 年以来以日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

王晓秋 / 62

## 满学：清朝统治的民族特色

——1990 年以来以英语发表的清史著作

综述之一

马 钊 / 109

## 清代社会史：下层社会与边缘人群

——1990 年以来以英文发表的清史著作

综述之二

葛治平 (Grant Alger) / 119

# 论著及文献选译

## 最后的王朝：清朝在中国的兴起和衰亡

[美] 波得·斯特恩等 赵轶峰 (摘译) / 133

## 尤·亚·戈洛夫金使团简介

[俄] B.C. 米亚斯尼科夫 宋嗣喜 (摘译) / 146

## 英国议会文件有关瓜分狂潮时期英国强租威海卫

资料选译

吴乃华 (摘译) / 163

# 名家访谈

## 清史编纂需要一面世界史的“镜子”

——访何芳川教授

197

## 论点摘编

- 围绕《大分流》(又译《大分岔》)展开的争论 210
- 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
- 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 彭慕兰 / 210
- 发展还是内卷? 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 评彭慕兰《大分流: 欧洲,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黄宗智 / 213
- 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
- 《大分流: 欧洲,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 史建云 / 216
- 《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 吴承明 / 218
- 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 张芝联 / 219
- 《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王家范 / 221
- 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 周武 / 223
- 生态缓解, 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
- 评《大分岔: 中国, 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崔之元 / 225

## 会议综述

- 清史编纂暨编译工作座谈会综述 王大庆 / 227



# 中西文化的抉择

——在“清史编纂暨编译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

□ 戴 逸

1  
专  
栏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非常欢迎大家参加这次会议，刚才成崇德同志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一是向大家汇报我们的工作，二是听取大家的建议，也就是我们拜师，向你们请教。我们请来的都是研究世界史的顶尖高手、领军人物，当然也不完全是世界史的，也有中国史的，中外兼通的学者。请你们从世界的角度，考察中国历史和编纂清史，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西方有哪些著作，有哪些研究中国的人物，我们必须加以注意，有哪些文献，有哪些著作我们必须加以搜集和翻译。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向大家请教、学习，希

望搞世界史的同志也能够参与到清史编纂的工作中来。

刚才成崇德同志详细传达了李岚清同志的讲话。李岚清同志特别强调编纂清史要注意和世界的联系。清代历史和过去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世界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清代历史的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离开世界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难以解释清楚清代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情况。很多问题不联系世界，就看不清楚。

清军入关是1644年，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已经一个半世纪，全球历史的帷幕已经拉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这样一些国家相继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南、北美洲已经成为欧洲的殖民地，世界其他地方：非洲、东南亚、印度、中东也正在遭到殖民侵略。这个时候的中国，她保持了国家的独立。但清朝历史和以前朝代不一样，一开始清朝崛起就和世界接触。如西方的红衣大炮，清入关前就开始引入，这里不多说了。清入关后，从顺治开始，就与传教士接触。顺治与传教士关系非常密切，他称汤若望为“玛法”，是父辈，很尊敬的称呼。据汤若望记载，在两年的时间里，顺治帝去了汤若望家24次。汤若望在宫里医好了皇后的病，得到了皇太后的恩赐，可以出入宫禁，与清廷关系极好。康熙更不用说，对天文、数学等西方科学技术都有很浓厚的兴趣，身边有很多传教士。康熙得了疟疾，当时的疟疾病是非常严重的，治不好，会死人的，康熙采用并推广了金鸡纳霜疗法。签订《尼布楚条约》前谈判的时候，张诚、徐日昇充当了翻译。《康熙皇舆全览图》也是传教士帮着画的。可以说，在清初，传教士与清统治者有着一段蜜月般的关系，非常亲密。满族的亲贵也有很多与传教士有很密切的关系，相比之下，汉族士大夫在清初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不多。明末的汉族士大夫，像徐光启、李之藻信仰天主教，可是清初的士大夫，我印象中没有几个。

我猜想，当时中国也是处在十字路口，也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作为统治者的满族，处在文化的后边的地位，它要学习先进文化。当时，它面临的先进文化有两种，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是汉文化。它和西方文化接触很多，也知道它的好处，为什么没

有更多地选择西方文化？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吧。后来，完全走了汉化的道路，而且越来越汉化。看来，它不是没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它有机会选择，但它没有更多地吸收西方文化，而是走了单纯汉化的道路。如果稍稍吸收一些西方文化，哪怕像日本一样，出现一个兰学，那中国历史的道路肯定会不一样。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

看来，文化的选择有一个土壤的问题。清统治者要统治汉人，因此，它选择的是统治汉人的现成的政治和文化模式，而不再考虑选择其他的模式，这也是一种解释。我觉得，清初的历法之争，表面上是汤若望取得胜利，采用了西方的《时宪历》，因为它是科学的。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从全面的文化选择来讲，汤若望失败了，而杨光先胜利了。杨光先是坚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抗西方文化的。因为中国走的道路依然是汉族的传统道路，没有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这是历史事实，清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政治和文化选择，一开始就面临着西方文化，这是其他朝代没有的事。

文化的冲击、磨合、交流，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历史上，佛教经过上千年的时间才融合成中国的佛教，因此，刚进入中国不久的西方文化不可能很快被中国人接受。文化的融合有独特的规律，历史有它的必然性。

清朝建立之初，要考虑统治汉人，必须尊重汉族传统的信仰和风俗。所以，传教士面临的困难越来越严重。罗马教廷坚持要反对祖先崇拜，这引起了汉人反对，满族统治者也反对。雍正时候，全面禁教，把传教士逐出宫廷，关上了大门。从历史的表面来看，雍正的全面禁教，似乎阻止了中西文化交流，但是历史是在前进的，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可阻挡，不可抗拒，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潮流也是不可抗拒的。

18世纪文化交流虽然被阻断，乾隆后期在宫廷已经没有传教士了，但中西方经济的交流大大地发展了。当时海关对外贸易急剧增加。康熙时期海关收入只有4万两，贸易额很小，到鸦片战争前海关的税收达到了190万两，增加了47倍，增加得很快，如

茶叶、丝绸、棉布、瓷器的对外贸易大量增加。到康乾盛世，海外贸易比较繁荣。

社会发展也达到了顶点。从人口来看，汉朝人口5 000万，唐朝是8 000万，后来也有增加，但中国的记录人口从来没有达到过1亿，明朝是七八千万，到清朝道光时期为4亿。相应地，农产品也只有增加4倍到5倍，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可以说，当时经济总量已超过汉、唐。根据外国的有关研究，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32%，这是外国人的统计；还有一种统计是24%。是否确切不敢说，但说明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

这些方面的研究都需要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结合，也需要你们的合作。我希望年轻的学者转而研究一些大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的经济实力到底如何？

康乾盛世如何解释，也需要世界历史的知识。不了解世界的情况，也难以解释康乾盛世。当时国内安定是个主要因素。不能老打仗，社会的安定对于生产的发展至关重要。康乾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投入大量精力治理黄河。有一年，国家收入的1/3用于治河。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南美洲的白薯、玉米、花生等作物在康乾时期得到广泛种植。这些作物传入中国是在明朝，但广泛推广是在清朝。如果离开了白薯、玉米，这么多人口怎么养活，很难想像。只有高产的粮食作物才能养活这么多人。而且，玉米、白薯的种植条件要求很低，对土壤、水、气候的要求不是那么苛刻，这些高产作物遍地可种。从前不能种的地方，开垦出来就可以种，平原、高山、地头旮旯都可以种植。乾隆年间，开垦了以前的很多荒地。因此，粮食产量较高。这对于康乾盛世的到来非常重要。

高产作物在中国的推广，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但还不够，这个问题的研究，也需要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专家合作研究。关于白薯这些作物如何推广的问题，值得研究。当时有个姓陈的福建人，带着他的儿子、孙子，山东、山西到处跑，一辈子推广种白薯。白薯种植一个关键就是育秧，他帮助北方农民解决白薯育秧过冬问题，像这类问题值得研究。可以肯定，南美洲作物的

推广对康乾盛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南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就没有康乾盛世。

另外一个因素是货币。当时墨西哥白银大量输入中国，这一点对中国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白银是良好的硬通货，当时的贸易连年出超，有很多东西销往外国，像丝绸、瓷器、茶叶；而外国人没有那么多东西运往中国，当时还没有大机器生产，只能用白银。有本书叫《白银资本》，轰动一时。讲当时中国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所有的白银都流向中国，中国是白银的仓库。据说，在18世纪，有3亿两白银流入中国。可以说，大量白银的输入，成为中国市场交易的润滑剂，扩大了中国市场，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当时中国货币流通量、交易量到底如何，这些研究大多都是宏观的，细致的研究还不够。有统计说，中国当时国内的总贸易量超过了英国海外的贸易量，到底是不是这样，需要中国史、世界史学者共同论证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因素，经济方面高产作物的推广，货币方面白银的输入，对康乾盛世的到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所以说，清初中外的文化交流虽然暂时中断，但经济交流更加密切，而且其实际影响非常大。到了晚清，更不用说了。如果不联系国际背景，根本没办法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清朝前期，中国还可以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是天朝上国，洋洋得意，自高自大，关起门来，可以高唱“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大门被打开了，也无法关门了。这个时候，中国就被彻底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旋涡中。

无奈也罢，被迫也罢，缺乏精神准备也罢，反正你是被卷入了世界历史旋涡。列强蜂拥而入，外国开始成为支配中国的一个力量。以前是外在力量，现在成为社会内部的力量，而且是强大的支配力量。一次一次的战争，一次一次的条约，把中国与世界绑在一起，变成了半殖民地。这个时候，研究中国历史，已经离不开世界历史。

反对西方列强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向西方学习同样

是中国的一个主要任务，这两个任务是矛盾的。受到外国侵略，还要向它学习，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历史就是这么复杂。老师打学生，这样的事在近代很多。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如果不抵抗，不反戈一击，一味认输投降，丧失的不只是物质财富，不只是主权、利益，丧失的还有精神、信心 and 希望。中华民族就是在抵抗中逐渐成长的。但是你光反对，不学习也不行，那样就没有进步，就会停留在愚昧落后的层次，就会停留在非理性的行动中，使你的抵抗斗争变成“义和团式”的行为，使你的爱国行为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正是这些经验教训使中国在近代逐渐走向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晚清与外国打交道非常多，外国传教士、政治家、军事家、记者都到了中国，他们写了大量的东西，但目前还有很多没有翻译过来。当然，他们的记载描述带有偏见，但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因此，清朝历史与以往的朝代不一样，它自始至终与世界历史保持着联系，你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观察中国，必须了解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编纂清史，如果不了解这些，清史没法写。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老师请来，给我们出主意。

有人去徐家汇看书，说那里有很多外文图书，有很多自清初以来的传教士书籍，但目前研究很少。像里希霍芬到中国来的考察报告很有价值，但现在也没有翻译。诸如此类，我们想对这类文献资料进行一定限度的整理，当然不可能全部整理。所以，我们成立了编译组，希望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今天请大家来的目的就是拜师，教我们如何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怎样增长有关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知识，了解他们的学术著作。诸位是世界历史专家，中西兼通的专家，想必各位在研究世界历史时，会联想到中国类似的情况和同时代的事情。希望诸位充分发表意见，从我们来讲，将受益无穷；对大家来讲，也是一种参与，即参与了众所瞩目的清史纂修，参与有几种，一种是直接写清史，一种是提供意见，一种是提供资料，应该都是不同的参与形式吧。



# 用世界眼光看清史

——兼谈中国文化于 17—18 世纪  
在法国的传播

□ 耿 昇

7

专题研究

国外史学界，都将 15—16 世纪之后的历史称作“近代史”，这与我国史学界以鸦片战争为界的传统历史分期法大相径庭。其实，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大产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然，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也并非仅仅是商品经济，而主要是商品化大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从这个时代起，世界各国（包括旧大陆和新发现的大陆）都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也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事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经不同程度地融合与联系在一起了。中国清王朝虽然以泱泱大国自居，从思想到国策仍

趋于保守，但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早已远播欧洲，特别是法国。中国学者对于清朝时代的西学东渐，已经讲得很多了。本文试就中国文化于这个时代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略作简单论述，借以勾勒大清王朝时代中前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之轮廓。

17世纪、18世纪的世纪之交，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其势力达到鼎盛时期的中国清王朝，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次盛世——所谓的“康乾盛世”。特别是清圣祖康熙（1661—1722）和清高宗乾隆（1736—1796），文韬武略，奇功盖世，创十全武功，修四库全书，在修身、齐家、治国方面，都堪称“杰出帝王”。康乾二帝都具有开放性思想，胸怀广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与科技，为促进早期的中外、特别是中欧文化与经济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遵祖制又具改革精神，是清前期改革开放的先驱。其结果当然是使中国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也使世界初步揭开了“东方巨人”的神秘面纱。当然，“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封建王朝已经开始走向没落。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极，欧洲第一王国法兰西正处在以“朕即国家”自居的路易十四（1638—1715）和路易十五（1710—1774）统治前后。这也是法兰西王国的封建制度从兴旺走向没落的时期。伏尔泰于《路易十四时代》中，把路易十四比做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公元14），他成了显赫一时的“太阳王”。史家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毕竟叱咤风云，征服佛兰德、进兵弗朗什—孔泰、进攻荷兰、炮击阿尔及利亚、降伏热那亚、收购敦刻尔克、援助德意志和葡萄牙。路易十四的一位心腹名臣——财政和国务大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于1664年开始创建法国东印度公司。他还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成员，又创办了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1663年）、法国科学院（1666年）和皇家建筑学院（1671年），特别是创办了法兰西罗马学院（法国四大海外学院中的第一所，其余三所依次是法兰西雅典学院、法兰西开罗学院和法兰西远东学院）。他煞费苦心地创建了专修东方语言的法国青年语言学院以及巴黎天文台，

从而为法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语言和科学人才。他支持深受中国影响的法国重农学派，并倡导引进中国的农作物和植物、农具和耕作方法，柯尔贝尔是路易十四东方政策的制定者和积极推行者之一，也是法国 17—18 世纪“中国热”的上层推动人物之一。

中西两种哲学思想和文化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冲撞、较量和交流，也互相施加过影响，但在清朝才真正进入了大量直接交流的时代。其媒介主要是当时入华的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们、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还有某些商人、旅行家和外交官。

文化传播是文明影响的前提条件。一旦必需的条件具备，也就是说在文化背景、人员交流、资料积累等方面，都做好充分准备时，中国儒家文化对于欧洲，特别是对于 16—18 世纪的法国之影响，也就会缓慢而又卓有成效地发展起来了。

非常奇怪的是，当时无论是在华传教士们，还是欧洲的许多文人学者，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奉孔子为基督教的前驱，而又将无神论归于中国学者。

在欧洲特别是法国，17—18 世纪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和宗教的著作铺天盖地。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也是不同修会的传教士们的主要争论焦点。它们震撼了整个欧陆，而且既错综复杂又极为激烈。如果说传教士们在许多问题上从未达成令人满意的共识的话，那么法国的文化精英们则利用他们的争论而获取了有关真正儒学的相当完整的知识。儒家事实上从不企图使用“宗教”的名称，而传教士们或出于基督教布教的需要，或者是出于成见和过分僵硬的宗教原则，始终都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传教士们是在欧洲哲学尚未从神学中彻底摆脱出来的时候到达中国的，当时宗教对于抽象思维的影响尚很强大。这些传教士们当然不可能设想出一种与他们的宗教大相径庭的思想意识。由于传教的需要，又为了讨得中国皇帝的欢心，入华耶稣会士们有意地将“儒教”与基督教相提并论。其他修会的入华传教士们，又嫉妒其耶稣会教友们成了中国宫廷中的高官，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破坏这种局面。后者公开声称，他们来华是为了传教而不